

明清思想启蒙的两难抉择（上）——以汤显祖为研究个案

邹元江

作者赐稿

—

[摘要] 汤显祖一生的心灵矛盾和苦闷在于文章名世与大道践履的抉择两难。矛盾的根源在于汤公具有强烈的对家族、师友和社会所期许于他的慧命担当意识，这激励了他“深心延不朽”的不朽之思；而与此同时，他也具有强烈的中国士大夫文人济世立功的情怀，这使他甚至认为诗人也“诚不足为”，“吾所为期于用世”。然而，当济世大道难以践履时，文章名世也难以理成前绪，一在“数不第，展转顿挫，气力已减”，一在“薄气未能免俗”，“遂拓落为诗歌酬接”，而“大雅久不作”。值得庆幸的是，正是在他一生最苦闷的时期，他领悟到“人生精神不欺，为生息之本”，终于心精力一，在他并不以“不朽”业自诩的戏曲“小技”上，成就了让后人惊叹不已的传世伟业。可惜，这真正辉煌的诗意人生对汤公来说却太短暂了，他终不能“绝去杂情”，终还是被“疵累”所囿，终凝铸成让后人扼腕叹息的悲剧。

[关键词] 思想启蒙 两难抉择 汤显祖

对明清思想启蒙特征的认识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视角。有的学者依据列宁分析俄国启蒙运动的三个基本特点，试图探寻中国明清思想启蒙与俄国启蒙运动所具有的“一般相似的规律”[1]（ P27 ）。也有的学者从个性解放的新道德、科学与民主三个方面寻求探索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路径[2]（ P7 ）。这些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本文对明清思想启蒙的理解并不采取这种宏阔的思想背景的把握方式，而是立足于明清思想启蒙在士大夫阶层自觉与不自觉的实际状况作一个案性的分析。本文认为，对明清思想启蒙的认识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启蒙思想的核心仍脱不了自然人性的张扬，这最明显地体现为形成了“唯知有我”（徐光启语）的个性解放意识。这就是王阳明倡导的“狂者胸次”，王艮褒扬的“我命虽在天，造命唯由我”，罗汝芳追求的“解缆放船，纵横任我”，李贽所鼓吹的“各从所好，各骋所长”等等思想倾向。但思想倾向与实际行动本身是否就能简单等同呢？启蒙时代的思想

家是否象恩格斯所说的“伟大人物”他们的思想倾向已直接转化为“自觉的动机”[3] (P57) 了呢? 本文不赞同这种过于乐观的看法。事实上即使是处于历史大转折之际的时代巨人, 其启蒙思想意识也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汤显祖正是这样一位有代表性的抉择两难的时代巨人。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 已六十七岁的汤显祖写了一首五言绝句《负负吟》:

少小逢先觉, 平生与德邻。行年逾六六, 疑是死陈人。

这首诗是汤显祖附在《答朱以功》的信中的。这封信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写这首诗: “如弟戛戛一生, 寡过未能, 盖棺已近。短歌志愧而已。”在这首诗的“序”中, 他谈到了为什么以“短歌志愧”的原委:

予年十三, 学古文词于司谏徐公良傅, 便为学使者处州何公鏊见异。且曰: “文章名世者, 必子也。”为诸生时, 太仓张公振之期予以季札之才, 婺源余公懋学、仁和沈公楠并承异识。至春秋大主试余、徐两相国、待御孟津刘公思问、总裁余姚张公岳、房考嘉兴马公千乘、沈公自进之荣伍, 未有以报也。四明戴公洵、东昌王公汝训至为忘形交, 而吾乡李公东明、朱公试、罗公大、邹公元标转以大道见属, 不欲作文词而止。眷言负之, 为志愧焉。

从“序”中可见出, 汤显祖在盖棺已近之时(汤公1616年7月29日去世)回顾自己的一生, 深感有负有愧的一是文章未能名世, 一是大道未能践履。可文章名世与大道践履本就是相反对的。这里边恰恰隐含着汤显祖一生的深深矛盾和苦闷。而这也正是明中叶思想启蒙中, 几乎所有有生命辘重承担意识的士大夫的共同特征。

一、慧命担当

当

本来, 汤显祖对家族肇端于皇皇帝王之气、灵根备启于纯粹鸿儒之质是深为自豪和认同的, 因而, 宗风的高扬, 慧命的担当, 就成为他生命抉择上不辱先贤“尊名”, 下不负“厚族”之望的心灵尺度。“文秀”、“武敏”, 或“扶义坚中”, 在他本是随顺性命之情的事。但事实上, 汤显祖自从幼年就显露出颖异不群的“神童”之质后, 来自家族、师友、社会的对他灵性的裁夺, 就一直伴随他一生。

“家君恒督我以儒检, 大父辄要我以仙游”。[4] (P23) 这是汤显

祖青少年时代，父、祖两代人对他的思想浸润。他虽率真地加以评说、婉拒（“第少仙童色，空承大父言”；[4]（P17 ）“儿非尧孔，又乏彭聃。无量无方，不得双湛”[4]（P967 ）），但父、祖入世、出世的人生态度，其影响之深，在汤显祖的内在心灵中形成的矛盾之大，却笃实贯穿于他的一生。

然而，来自社会主流文化的评判所带来的影响，更能左右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关怀。何镗作为江西提学使，主持省内各地府、县最后一场考试的最高官员，他所作的评价，在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心目中的决定意义是可想而知的。何镗指书案为题让汤显祖破题，他略一沉思，引《易经·系辞》之语侃侃而答：“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对于聪颖过人，五岁就能属对的汤显祖，本不是很为难的事。然而，提学使的“见异”和“文章名世者，必子也”[4]（P714 ）的过高期许，不能不让汤显祖的家人、族人引以为荣，这也自然给汤显祖以深刻的影响。他抱着羸弱的身体，终于苦吟成为海内闻名的举业大家，正说明这“文章名世”之期许的影响之大。

但问题在，能否将八股举业文章作为生命之重、人生之大业来担当。极具独立意识，“我能转华法，不为华法转”的汤显祖，其实很快就在中举之后，对举业文章名世并不以为意，而转向六朝诗赋，所谓“才情偏爱六朝诗”。[4]（P213 ）这种转向的重大意义在于，汤显祖随顺其诗性智慧之兴趣，对扼杀人的性命之情的八股举业之文，产生了强烈的心灵疏离感，而回复到作为诗意人生的灵根自由发挥和创造的世界。这实际上是人性的复归。这与许多科举中人终其一生，蹭蹬酸楚，也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早已被八股文所杀、所异化相比，无疑具有极强的叛逆性和人性自觉。汤显祖如此细致地描写《牡丹亭》中的陈最良，其中正深深寄寓着自己的沉痛体验和对举业中人的哀鸣。

汤显祖不以八股文章名世作为自己的生命大业来担当，恰恰说明他是自觉有负于“见异”于他、“异识”于他的诸位“先觉”。其实，他并无所愧，直到晚年，他还在规劝向他学举子业的人不要耗费青春于埋没性灵的八股文（给张大复的信）。不过，他仍以感激、抱憾的心情，向这些赏识他的人表示敬意和歉疚。但汤显祖又确实是对邹元标等这些“忘形交”，对他以“大道见属”而深感有负的。这缘于他青少年始就颇为自负的入世情怀。

当汤显祖几番春试不第时，他叹贾谊宦速达，知名汉庭，而为自己尽负才气却不达哀叹：“天短之，然又与其所长，何也？”“何独士之不遇乎！”

[4] (P152) 可当他一但步入仕途，就踌躇满志地对自己整顿乾坤的能力颇为自信：“某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4] (P245) 而他的耿直狷介之质，嫉恶如仇之气，恃才傲物之势，终使他在替天行道的仕途之旅上一再受挫，终至于感宦藉难遂，大道难行，“世道之难，吏道殊迫”，“补天”梦破。由是，“已迷生路，宁识归津”。[4] (P983) 这对汤显祖来说，实在是无奈之归途。所以说是“无奈”，是说他并非就想壮志未酬而隐退，因为他曾在遂昌知县任上初试他治世之锋芒，成就了政通人和，“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的美名。而他也确曾有过诗人“诚不足为”，“吾所为期于用世”的誓愿，即他曾将治世行大道，作为自己生命意义展开的大业而承担。但问题在，他又不愿以人格辱没来换取宦途的伟业，因而，他自然不被俗世所容，被视为“狂奴，不可近”。虽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些正直的人为他不能有更大的抱负伸展而叫屈，也一而再、再而三为其力争、鸣不平，但他终究要有负于以“大道见属”者。他自己对此也悲哀不已：

道情难逐世情衰，满目伤心泣向谁？[4] (P709)

这道情难忘的伤心泪，汤显祖一直到死也没有流完过（这首诗作于1614年，汤已六十五岁）。但事实上，汤显祖却并不愧于大道见属之心。他是真正将治世之道，作为疗救颓败社会的艰难伟业而全身心投入的，因为在他心中，有强烈地成就不朽之大业的意愿。

二、不

朽之思

鲁襄公二十四年春，鲁国执政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的范宣子问叔孙豹，何谓“死而不朽”？叔孙豹未语。范宣子说，昔甸之祖自尧、舜、夏、殷、周，直至他们晋国当代范氏，都受封享禄，这是“不朽”吗？叔孙豹则不以为然，说这不过是“世禄”而已，“非不朽也”。那么，什么是“不朽”呢？

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5] (P189)

“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对中国士大夫文化人格的

生成影响深远。它的精神实质在，人如何在短暂的生命时限里，开辟出能够长久地影响历史的道路。所谓“不朽”，即不因形骸颓败而失去分量的生命之重、生命之贵。汤显祖曾以孔子为例论及“三不朽”与富贵、贫贱和寿夭。他说：

富可寿乎？富有万种，于世无一饭之泽，其寿何为也。贵可寿乎？贵为卿相，于世无一言之教，寿何为也。〔 4 〕（P1058 ）

“一饭之泽”即“立功”；“一言之教”即“立言”。功不在大小，言不在多寡，关键是人活在世上，要给人们一些惠泽、一点教益。人之寿否，在是否泽被他人；人之贵否，在是否以启山林。泽被他人，其寿就非命寿，而是寿比南山，其恩泽千年不朽，与自然同在；以启山林，其贵就非谥贵，而是贵为上宾，其教诲余音缭绕，与天籁共鸣。

汤显祖一生“贞于孔阜”。〔 4 〕（P1024 ）他说：“孔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至于蔬食饮水，在陈、蔡，藜羹不糝，数日不举火，亦可谓贫且贱矣。”〔 4 〕（P1058 ）孔子在陈国绝粮数日，在蔡国被人追杀，真如丧家之犬，弟子都不能忍受，几乎溜光，可孔子却不以为意，弹琴自若，曰：“知者乐，仁者寿。”并不觉贫且贱。要论寿，孔子寿至“从心所欲不逾矩”〔 6 〕（P12 ）的七十有三，已可谓高寿。然而孔子并不以年寿为乐。他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亦可以无大过。”〔 6 〕（P71 ）这也就是孔子自己所说的，只要“朝闻道，夕死可矣”，〔 6 〕（P37 ）并不在意寿至年高与否。可见，孔子对富、贵、寿的理解，并不在富可抵国，贵为至尊，寿比彭祖，而在生命的质量，闻道与否。由此，汤显祖说：

夫所望以《易》终者，得五十而可，而乃天幸至七十，得以不逾矩，孔子之乐且寿宜何如。然且喟然而慨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然则其所志学，岂止七十其身之不逾矩而足哉，盖将有所行于天下。在《易》之观，上九，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言其志非所以观九五之生而已。世有孔子之年，而无周公之梦，虽富且贵何如哉。〔 4 〕（P1059 ）

本来，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从心所欲不逾矩”正是很高的心灵境界。从十五岁志于学，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应转化为一个有意义的存在物，到三十据礼而立，确立自己应担当的社会责任；从四十不惑对自己人性的全面

占有，挺立坚执于道的心灵人格，到五十知天命，意识到天命不可违，而人应有所为的使命感；最后从六十而耳顺所达到的悠然自得状态，进入生命和谐圆融的最高审美心灵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真正是完成了人的生命存在所可能具有的最佳状态：尽善尽美。

而汤显祖却认为，孔子所志于学的终极关怀，并不仅仅在不逆大道（矩）、获得其心灵自我完美的自由状态，而是要将这种“内圣”推向“外王”，即“有所行于天下”。在汤显祖看来，孔子之所以为自己“不复梦见周公”[6]（P67）而悲叹，这既是激励自己不能须臾忘却以天下大业为己任的承诺，也是因为周公是他所最仰慕的立大德、大功、大言之人。孔子“吾从周”，一在有“郁郁乎文哉”之大美的周之礼仪制度，一在“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6]（P84）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克己复礼为仁”的理想，正是复周公之礼、周公之德。所以说，孔子以仁释礼的思想正与周公“敬德保民”的思想相涵咏。作为鲁国陬邑大夫之子的孔子，自幼就通过周朝遗传下来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熏陶，而亲身体验了周公“敬德保民”的思想。孔子梦周公，是因周公是他的人格理想，是他的思想寄托，是他的价值尺度。存周公之梦正是孔子一生的生命意象，他甘愿为此生命意象的显现之大业，颠沛流离，周游列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所以，深得孔子之心的汤显祖，对孔子的周公之梦极为推重：“世有孔子之年，而无周公之梦，虽富且贵何如哉。”“周公之梦”也成为汤显祖所自悬的生命之重的意象和维度。而这意象世界并不是尼采所说的，“把虚无缥缈当作目的”的世界，而是像康德所说的，生活在“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的“理想的世界”。成“三不朽”之伟业，首要的就是要使心灵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而灵魂中有“理想的世界”的牵引、感召，就能使生存在神圣、诗意、凝重之中，就能成就大德、大功、大言。汤显祖在《诀世语》里“一祈免崖木”，认为尸骸化者以沙木坚厚为度，不必悬棺崖上，以期存久远。“阔崖无厚质，虚花诳人眼”。言下之意，生命的厚质、灵魂之重，崖不足眩，而在铭刻于人们心目中的大德、大功、大言之碑上，此为真不朽之质、之重。但究竟何为“理想的世界”，汤显祖入世愈深，愈感到大有分别。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何为真不朽，汤显祖随着仕途前景渺茫和知天命之年的到来，他亦开始慎思而不自欺。

在汤显祖的时代，世上最大的功名莫若为官。汤显祖受家族、社会的影响，亦不能免俗，淡化此情结。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汤显祖被量移浙江遂昌知县任，这为他一直想有用武之地的雄才大略提供了机会。在这“斗大平昌”县，他的作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以清静理之。去其害马者而已”。因而“士民惟恐弟一旦迁去，害马者又怪弟三年不迁”。[4]

（P1344）他以诗人的心胸，承袭孔子仁政、周公礼乐之策，修尊经阁（图书馆）、新启明楼、建射堂、起书院，时为百姓“陈说天性大义，百姓又皆以为可”，[4]（P1354）又常“与诸生讲德问学”，“一意劝安之”。[4]（P1366）甚至除夕“遗囚度岁”，元宵“纵囚观灯”，用得民和。这样一来，虽“五日一视事”，可却以礼乐无为之治，使这原本赋寡民稀之县，一时间“赋成而讼希”（同“稀”）[4]（P1354）到任第二年，就仅“讼裁五十余”，[4]（P1355）逐步开始在一偏远贫瘠的斗大县中，实现着他礼乐仁治理想国的梦想：

风谣近胜，琴歌余暇，戏叟游童，时来笑语。[4]（P1342）

真正是汤显祖一生之中“当其得意”之时。这“理想的世界”，在《牡丹亭·劝农》和《南柯记·风谣》中，都作了热情地讴歌：

征徭薄，米谷多。官民易亲风景和。老的醉颜酡，后生们鼓腹歌……

[4]（P2355）

汤显祖虽常说自己“久不习为吏”，[4]（P1364）“仆又不善为政”，[4]（P1354）“弟素不习为吏”，只是遂昌“士民雅淳，可幸无事”，[4]（P1364）但他的心之真迹却是颇为自己的政绩得意过。他认为他之所以能用得民和，一在善行其意（“丈夫涉世，亦贵善行其意，俗吏不足为也”[4]（P1342））；二在悠然之心（“至于世寄，可与悠然，悠然之心，差可寄世；”[4]（P1341）“大智闲闲，利用安身耳”；[4]（P1341）“平者，道之滋也”；[4]（P1349）“弟少才，官之易而安，兄才多，官之难而为”[4]（P1353））；三在清廉吏治（“世俗何知清吏之苦”；[4]（P1345）“诸君贫而病，令尹病而贫。山水寥寥，爱莫能助”；[4]（P1365）“民气雅淳，不忍笞[chi，用鞭、杖或竹板打]，间以示众而已”[4]（P1364））。但汤显祖一时“醇吏之声为两浙冠”，必然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必然遭人嫉恨。尤为直接

的是来自在京为官的遂昌乡绅项谏议、项应祥。汤显祖任知县时，项以疾病请告在遂昌休养，汤显祖曾向这位当地最大的乡绅催交赋税。这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所以，当汤显祖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上京述职时，便“谒上官不得意，忽忽（疑为“匆匆”）思归”。[4]（P1324）汤显祖或许并不知个中原委，但从项应祥留下来的《柬汤明府》一信可知，是项应祥从中作了手脚。汤显祖在回遂昌的车、舟之中，“念及半生游迹，论心恻世”，[4]（P1352）深有“美才不偶于时”的“沦落”[4]（P1352）感。对虽有“蜚鸟之音”，却“下而不上”的宦路前景深为忧虑。但仍想“从容观世，晦以待明”。[4]（P1292）或许也正是从在遂昌任上第三年京都失意开始，汤显祖“道体似盛而羸”，对仕途大道已无多少眷念。“观生进退，良已裕如”，[4]（P1371）他已意识到了“人生忙处须闲”[4]（1368）的生存方式的意义。

注解见下篇。